

对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社会 ——文化分析 韩国的经历

[韩]朴永信

众所周知 在 40 余年时间里 韩国经济有了重大的增长。与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相比，各主要经济指标都有了显著增加，例如 人均收入从 1954 年的 80 美元，1962 年的 96 美元，1979 年的 1662 美元 提高到 1987 年的近 3000 美元。尤为重要的是 国民总收入增长率平均每年为 10% 与此相应 农业人口和播种面积明显减少，工业部门雇员数和产量增加。1953 年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 82% 但到了 1983 年 这一比例下降到 32% 同年制造业人口增加到 50%。随着工业的增长 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另外，总人口中绝对贫困者从 1965 年的 40.9% 下降到 1980 年的 9.8%^①。这一经济奇迹使许多评论者不再使用“第三世界”一词 改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并且使用了“四小龙”(或四小虎) 一词 即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这是一个褒义词，而中国通常被视作巨龙。

许多评论者试图探究韩国经济增长之谜。在世界银行、韩国发展研究院和其他政府及半政府机构的研究报告中，几乎所有的分析者都限于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分析。近年来人们通常认为经济发展加强了政治和经济的互相依赖，但是，少数研究者试图从经济领域之外寻找原因。对于韩国的成功，仅仅研究资本形

成、进出口贸易、政府政策和投资等等是远远不够的。对这个复杂的过程，绝不能仅限于经济分析。

我们必须考察与韩国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这是因为，经济与相应国家的特点以及特定时期的情况变化相联系。例如，经济的增长，包括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技能的提高都有赖于韩国采用技术的能力。通过商业、政治、文化等交流获得知识和技术的能力，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进行竞争的能力。这些能力都与文化有关。所以人们必然会提出如下问题：韩国究竟具有什么人力资源，他们是如何取得巨大经济增长的^②。正如社会科学必须认识到文化对于发展理论的重要性，理解韩国的经济成功，必须考察其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传统。

本文将讨论社会价值观和当今韩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传统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得到运用。在什么程度上和为了何种理由，价值观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呢？显然，韩国经济成功的关键之一，是其社会—文化特点，亦即为了发展经济而获得民众支持的能力。

一、基本的社会价值观

在韩国，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并不是某种宗教的伴生物或突然形成的，而是历史上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产物。与其他社会一样，韩国的价值观有其漫长的形成过程，而且肯定早于高丽时期，当时佛教是社会生活的主要部分。可以肯定地说，在朝鲜时期，随着儒学的制度化，韩国基本价值观已经大体上确定。所以应对朝鲜时期作一考察^③。

首先应当指出，朝鲜时期儒学信条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虽然本国固有的文化观和宗教传统依然存在。儒学权威性的获得，与朝鲜王朝建立后对儒学的扶植有关。当然，儒学的制度化

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人们的行为也并不完全符合儒学的价值观。但是，朝鲜王朝初期的社会精英承担了阐述和传布儒学信条的责任，与此同时，也得以光大儒学的价值观并使之制度化。于是，儒学价值观超越了传统社会的其他观念，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并决定着其他社会标准。

韩国社会的传统道德规范可归之为“五伦”，它规范着君臣、父子、夫妻、长幼、朋友这五种关系。除了君臣和朋友外，儒学原则规范着家庭关系。虽然在任何宗教传统中家庭都占有中心地位，但儒学传统赋予家庭关系在道德规范中的特殊地位^④。朝鲜时期的儒学精英，都强调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协调平衡，但他们都认为家庭和家庭关系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儒学的某些派别主张“君、师、父合一”，旨在强调政治、教育、亲族领域中道德义务的并重，尽管在家庭中对父亲的服从要超过对其他社会关系的伦理义务。家庭之外的伦理义务，无论从紧迫性还是从程度上而言，都比不上孝道。在同对政治秩序的服从相比时，这一点更明显。在讨论王权的政治合法性时，通常强调“君主必须尊重民意”的传统原则，这一原则十分接近儒学中的“民为国本”。“民本”的说法通常会使人认为传统儒学中有着民主的思想。然而，即使是对最高政治当局即君主的义务，也及不上孝道；与政治团体相比，家庭得到更大的重视。

这一观点体现在朝鲜王朝初期的重臣郑道传的著作中，他描述了国家结构、权力关系的基本模式，以及社会的和政治的过程，表达了朝鲜王朝尊崇儒学、鄙视佛教的政策。在他的代表性著作中，孝道被视作所有行为的规范和一切教育的目的；孝道和家庭的最高社会价值便是所有儒学思想和价值观的主题。传统的主流派和所谓的实学派均持上述观点。应当指出，上述价值观的正统化，反映了精英们试图将其植入行为规范并为民众所接

受，使朝鲜王朝作为儒学社会而合法化，进而成为邻国的道德楷模。儒学关于社会关系的规范如忠、孝、悌、信、义特别受到年长儒士们的推崇，从而成为被统治的民众的所谓美德。

宗教和伦理的价值观的地位，集中体现在亲族关系中，并因家庭这一概念而得到强化；而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官僚结构和教育过程，实际上又成为这些价值观的基础。宗教和伦理的价值观发展与渗透到社会各领域的儒学观点，包括社会秩序、责任义务、教育制度等方面。换言之，一切社会领域都有着表示其合法性的宗教含义。事实上，宗教和非宗教已经没有明确的界限了。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传统韩国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已经被“融合”了^⑤。当然，朝鲜时期国家机构和社会关系的实际运作并不理想化。由于社会各阶层地位的重新整合以及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传统的社会构架逐步崩溃。到了朝鲜王朝后期，尽管政府实现了改革，社会不满却日益严重。在文学、思想、宗教等领域新的社会运动以各种形式勃兴。改革思潮、西方学说、启蒙思想和基督教的出现，冲击着传统社会。在社会精英和不满的民众之中，正酝酿着一场重大的社会运动^⑥。但是他们都保持着儒学的价值观，儒学仍被认为体现着理想的、自然的社会力量。

几个世纪以来，儒学价值观主导着社会行为和社会生活。传统的社会价值观有助于个人和团体对付紧张困难的处境，特别是在工业化进程中。这些价值观规范着人际关系和行为准则。家族的重要性超过其他社会关系，但与此同时并不破坏整个社会的平衡。家庭被认为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它最能激起人们的道德义务。因此，维系家庭并实现相应的目标，要比国家的和其他非家族的目标更能受到人们的关注。

二、文化资源和经济行为

在韩国 传统的社会价值观 特别是关于家族问题 的重要性明显超越其他社会领域。因此，我对于有关家族的观点和概念，以及它们对今日韩国的影响，颇感兴趣。以下的讨论并不涉及特定的家族问题，而是就普遍的和历史的意义，探究家族对于韩国社会的稳定 and 变化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

近代韩国的历史，是大国为控制韩国而争斗的历史。19 世纪后期，朝鲜王朝放弃了孤立主义政策，旋被卷入国际冲突，最终于 1910 年被日本吞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韩国重新获得独立，但却被划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分别为苏联和美国军队所控制。1950 年韩战爆发 整个半岛经历了 3 年的浩劫。本文述及的经济增长 就是与南韩的复兴和发展密切相关。

近代韩国的动荡还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与经济发展不无联系。例如，旧王朝的社会等级制度瓦解，仕途不再为“两班”所独占。教育的普及和发展 向社会大众敞开了教育之门 激发了公众对教育的积极性。对教育的重视与关注社会进步的意识有关，而这种意识是建立在传统的家族价值观基础之上的。尽管旧的社会结构已经瓦解，但在安排个人的重大社会行为时，家族仍然发挥着作用。普通民众以往未能接受正规教育，但是，对于家族的义务和责任却是超越时代的，它促使家族成员在一定的条件下为家族尽力。而正规教育的普及，通常把对家族的义务和责任推及更广泛的公众领域^②。在美国教育的平均主义观点的影响下，韩国的教育改革成为重新构架社会关系的开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家族成员将其义务和责任推及社会领域。

与教育的普及相关 对社会成员参政的障碍也减少了 政权

回到了韩国人民的手中。从整体而言，国家日益成为自由公民的联合体，并且仿照美国的民主模式发展政体形式。这一过程同教育的发展是并行的。政治的开放是政治发展的必要条件，尽管只是形式上的民主，作为独立的国家，韩国毕竟经历了民主思想的洗礼和改革。朝鲜时期的教育制度曾使儒者入仕。在日本统治时期，以往由“两班”把持的权力结构未经政治和社会的改革而保留下来。日本殖民统治结束后，政府进行了民主改革，政治不再是贵族以及少数与日本合作的韩人的独占领域。特别是 1990 年之后，对全体国民而言，参政第一次具有了现实可能性。这为韩国所有的社会阶层提供了推动社会进步的机会。在传统社会中，宦途是最高的取向；而一旦对公众开放，只是为了从整体上加强政治性。至于儒学价值观，许多韩国人仍认为它对于社会和政治领域具有支配作用。在参政问题上排除了传统的和殖民地的障碍之后，韩国国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们试图通过进入最好的学校而在政府中谋得职位。

与二战后新获得独立的许多其他前殖民地国家相比，韩国有许多不同之处；但也力图摆脱殖民地的以及本土的专制主义的影响。然而，当人们意识到振兴国家的曲折性和新政府处理经济问题的能力的有限性时，对于独立的欣喜很快便消失了。韩国一度只是服务于日本的经济，向日本输出原料，同时是日本产品的市场。按照诺曼·杰克伯的说法，韩国只是“近代殖民地性质的不发达的经济”^⑧。事实上，对大多数人民来说，独立意味着生活水平的下降而不是提高^⑨。韩国刚从最残酷的压榨下摆脱出来，它的经济振兴十分困难，而韩战更使之雪上加霜。

韩国面临的困难似乎是难以克服的。但是，新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使它能够推行自己的经济政策，这一体制不再服务于政治压迫者或经济剥削者。该体制是美国军政府按照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倡立的，它有助于摆脱困难，动员韩国人民发展经济，而

过去他们几乎没有经济成功的可能。

政治体制的改变，有助于动员巨大的潜力投入经济活动。但与此同时，韩战结束后头几年的政治困难、混乱、人口增长和食物短缺，阻碍了经济的增长。最大的政治改革成果是新共和国的建立，尽管需要采取可行的具体政策。只有知道了上述这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只是从 60 年代中叶起即 1961 年军人集团推翻了民主政府之后，才开始实施可行的经济政策^⑩。

军人集团确实希望发展国家经济。他们宣传夺取政权是为了帮助人民摆脱贫困。他们把种种低效和腐败归之于旧政治和政客^⑪。同绝大多数军人政权一样，军方领导人不喜欢民主政体和民主进程，他们向往效率和擅权。他们关注的不是政治发展，而是国家经济能按自己的道路发展。他们是军方的专家治国论者，曾经在美国军事院校接受有关近代管理的教育和训练。军事政权把经济目标置于政治之上，他们甚至宣称，对于一个资源缺乏的国家来说，基本的民权只是一种奢侈，尽管在经济发展的西方民权也许是必要的。军方领导人向全体国民许诺经济利益，他们把发展经济视为神圣的思想，认为是社会唯一的目标。

军人政权常以发展经济的目标为借口，否定基本的政治权利。这一说法往往能论证其政权的合法性。事实上，军人政府一度获得了国民的信任和支持。显然，历经战争磨难的国民，无论贫富，都意识到确保物资供应和经济繁荣的重要性。但是，仍有许多人在考虑着经济发展和社会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尽管对金钱和物质的追求欲望超过以往，但并不能说这种欲望已成为价值观的主体。与此相反，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和发展经济的目标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事实上，儒学的观点已从教育和政治领域延伸到经济领域。经济发展的目标固然与人们从事经济活动、追求更大的利益相连。作为家族，其价值取向不仅在于投入经济活动，而且希望整个经济的繁荣。军人政府获得相

当部分韩国国民的支持，这决非偶然。这种支持正是如下社会价值观的本质体现，即强调为家族而工作要重于一切。与此相应，通常认为各个社会成员应该为改善其家族的社会地位而全力以赴，并为各自家族的荣誉和利益而互相竞争。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军人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的基础。

据上所述，韩国经济的发展同本国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并不相矛盾。而通常认为，非西方社会在探寻工业化之路的过程中，往往与其文化传统相冲突。韩国的经验无论在理论上还在实践上，都有其特殊性。在韩国，社会价值观和经济发展政策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60年代末和70年代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曾经提出“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努力工作”的口号，该口号的含义实际上是“为你的家庭幸福而工作”，并且激发了与家族观念密切相关的巨大的工作积极性^⑭。

在大多数新发展中国家里，制造业雇佣着大量的女工，她们工资低微，工作时间却很长。毋庸讳言，这正是维持经济增长率和使“经济奇迹”成为可能的基础。在迅速工业化的年代里，许多女工来自农村地区^⑮，她们通常声称是“为了帮助她们的兄弟继续上学”^⑯。在有关女工的自传性作品中，也可以发现同样的说法。这表明，许多女工和其他人一样非常向往学习，但她们受教育的机会仍然受到性别的极大的限制。女工自我牺牲或受压迫的事例是哀婉动人的，这表明她们是十分看重家族的。

与上述事例同样能够说明文化传统影响力的，或许是人口计划政策。这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西方国家常常警告说，不发达国家资源有限但人口过多。但是，韩国却通常被视作“家庭计划”成功的范例^⑰。文化传统在这方面起了作用。在全体国民中推行家庭计划政策的过程中，政府不可避免地面临传统的家族价值观，即极为重视子孙后代特别是男孩^⑱。但是，家庭计划政策最有效的一点是尊重传统的家族价值观，呼吁为了家庭的

更大幸福而限制出生率。与大部分西方国家不同，在此问题上没有公开讨论基本道德问题，没有涉及诸如胎儿的生存权等问题，也没有出现男女平等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与此相反，人们关注的是整个家庭的利益和幸福。例如，控制出生率是经济处境困难的家庭的必然选择，这里并不涉及任何道德问题。在多子多福、居住环境、生活条件等方面，人们的看法有了明显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概念和家族价值观的变化。

家族价值观还为工业组织提供了基础。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近来对韩国的公司组织产生了兴趣。他们关注韩国的财团，认为其结构与日本明治时期的财阀相似。在公司有居其中心地位的董事长通常是公司的创始人，在上层起协调和团结作用；当他转向新的投资目标时，便把公司的管理职能交给亲属（更多的是托付给一个机构）^⑧。自然，董事长及其亲属握有所控制的公司的大部分股额。结果，在韩国不仅有经济集中，而且是家族控制。我们的讨论还涉及到金广全先生对于韩国主要大企业的分析^⑨。他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企业的家族特点。在对约 100 个大企业的高层行政人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金发现其中 12% 的人属于“世袭”与企业的创始人有关，而创始人的儿子或兄弟占很大的比例。非世袭行政人员在增加，他们与企业创始人没有血缘或婚姻关系。但是，在这些职业管理人员中，很大一部分人与创始人有着地域的、学校的关系，或是密友。进而言之，这意味着雇员的个人忠诚和关系是企业上层管理者十分重视的因素。金还认为，职业管理人员的增加是一个积极的变化。笔者原则上同意金氏的观点，但是，企业组织的家族性并不会轻易地因管理层构成的变化而根本改变，无论胜任的经理是否通过公开的竞争考试入选。家族价值观并不完全等同于亲族制，而是高于亲族关系和经济关系之上。这种观念并没有削弱，仍有极强的影响力。在韩国社会基本结构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个人和组织行为

的性质将继续侧重于控制和影响着社会群体的血缘关系，侧重于把社会成员紧密维系如同家族一般的人际团结，侧重于对家族整体荣誉和兴旺的责任感及义务。

三、社会—文化资源的有限和对发展的制约

正如我们所知，韩国的高速工业化是在军人政府的压力下进行的，除了政府许可的劳工团体外，所有经济企业的团体运动都受到严格的控制。由于没有相应的制度保证，诸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职工权利等问题，都不可能通过任何工资谈判、协商或直接的工业行动，得到根本的解决，小规模罢工也很少发生。在当今时代，很难断定工人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会发展成为觉悟的阶级。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和企业领导人以及政府决策者有着某种共同的重要的价值观，即都承认企业成功和发展的的重要性，因为这是维持他们生存和改善他们条件的前提。进而言之，他们都意识到，公司是一个家族式的团体，他们可在其中发现和谐与友谊，他们之间也因此而系缚为一体。例如，有份报纸提到过一位公司董事长，他声称，典型的公司“应作为家庭一样来经营”^⑨。这听起来十分造作甚至是“反动”的，但这种类型的管理确实可以平息低收入工人的愤怒和不满。他们不仅是工人，更是韩国人，他们有着深厚的家族观念。他们被鼓励成为第二家庭即公司的一个部分，在那里，他们个别和共同地对上级保持忠诚，有的还共同住在公司建造的宿舍里。这同他们出生和度过早年时光的家庭相比，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当然，在那样的环境里，只要有关家族的概念仍然在起作用，工人便会如同孩子一样，他们的意见不会被全部倾听，常常被歪曲，他们难以形成鲜明的阶级意识特别是阶级斗争的思想^⑩。因此，只有当工厂或公司的家族式的社会关系被打破时，工人们才有可能介入激

烈的行动，尽管劳工运动的出现还有赖于许多其他社会条件。

社会价值观的作用还体现在学生身上。事实上，近几十年来，几乎年年发生学生领头的抗议活动。韩国近代史上有着学生投入政治运动的光荣记载。从反抗日本统治的 1919 年的“三一运动”到推翻政治强人李承晚的“韩国的 1960 年之春”直到近年的反政府抗议，许多学生曾遭到折磨，被投入监狱，甚至遭到当局的杀害。他们继续处在政治舞台的中心。本文并非专门对韩国学生运动作社会的和历史的分析^④。在此我只是强调指出，家庭的观念十分普遍，当局也试图以此来控制学生运动。一位西方观察家曾有如下描述：“警察威胁父母设法让学生脱离政治活动，否则他们全家将会遭殃。”^⑤用这一方式来处理学生运动颇有成效，因为它涉及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在学生们的政治观点之外，他们仍然受着韩国社会价值观体系中的孝道的影响，因此难以无视或违抗父母。只有父母本身也对政府当局产生不满并且不愿在家庭充当政治控制的角色时，学生的抗议活动才可能得到加强和扩大^⑥。发生在校园的动乱可能使人认为学生是唯一的反抗政府的力量，但事实并非如此。有时候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学生终究处在家长的影响之下。

家族观念在政党政治中也有体现。自从光复后，政治团体如雨后天春笋般地出现，人们对于政党的成立和解散、结盟和分裂，已经习以为常。从根本上来看，政党是围绕着强人的派系，该强人庇护着他的追随者并界以利益。1987 年发生的反对派向执政当局的攻击，就反映了家族观念的影响。当许多选民对通过修改宪法来解决政治危机已不抱希望的时候，执政党突然宣布废除现行的选举制，该制度本来是为了限制充分的政治竞争，以便于继续把持政权。反对派是在偶然的情况下有机会问鼎的，他们攻击执政当局的合法性，吸引了许多不满的民众。然而，这一历史性机会转瞬即逝，并非由于政府的镇压，而是因为两位反对党领

袖之间的互相攻击。他们的追随者也因地区和对个人效忠的不同而发生了分裂。两位领袖间的分道扬镳极大地损害了他们的政治生涯，并使他们的追随者和学生运动者大为失望。

有关研究者又开始讨论派别问题。有的探究某些历史事件背后的派别原因，还有的分析派别问题与国民性的联系。但是，仅仅指出以往的事例或特点是不够的。派别问题与家族观念、亦即韩国价值观体系中的社会和文化的部分有关^④。家族在社会价值观体系中远比其他关系重要。与此相应，对家族的忠诚、义务以及团体内的团结精神等所产生的政治能量，也完全可能被用于反对派活动、谋反叛乱和家长式控制。应当指出，一方面上述观念有助于限制极权主义的出现和持续，因为社会下层有着强烈的家族观念，这将使来自社会上层的控制企图难以实现^⑤。另一方面，浓重的家族价值观将难以保证民主的统治方式，这种方式将比较恰当地处理社会问题。所以，需要摆脱狭隘的家族价值观。

如果一个社会已经开始建立民主制度，就必须超越狭隘的经济和政治观念，追求更全面的社会责任、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应当超越依然渗透于韩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家长制观念。

四、结 论

在浓厚的家族价值观之下，韩国的经济动力和政治热情继续在增强，从而使韩国社会的发展呈现朝气蓬勃的前景。从经济发展和传统的社会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来看，价值观体系有关家族兴盛和社会进步的取向，无疑有助于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下，对经济利益和社会一政治目标的追求，已不再限于少数人，所有的韩国人都可能成为雄心勃勃的经济一政治动物。以欧洲中心论来界定韩国的经验显然不能使人信

服。韩国的社会和经济的近代化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但却没有按照西方的社会发展模式，也没有像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那样打破了“血亲的束缚”^⑤，而是按照亚洲的模式在“血亲的束缚”之下。家族观念如同蓄水池，它可以吸纳一切东西，只要它是合理的或有合理的方面。

当然，还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知识分子和社会评论家已经指出，如果经济发展是不能放弃的，那么该如何来评价韩国社会的价值观。这一价值观不仅在经济发展中是一种积极的力量，而且构成了韩国的特征的一个基本部分。然而也有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忠于家族的价值观念能否承受和加强民主的政治秩序。如果韩国社会希望有更多的民主和正义的话，它将在忠于个人或家族的观念之外，发展公共责任和公民的意识。

有鉴于此，我们必须讨论价值观的政治和伦理的意义。经济发展的作用有目共睹，也就很容易从经济的和功利的观点出发，用经济的标准衡量一切。我们的视界会只关注物质利益，忽略社会的和政治的弊病。一种健全的社会生活决不仅限于享乐、功利和家庭，它必须发展成一种平等参与的共同体，不满足于各种人为的社会模式。只有通过建立这种健全的社会生活的过程，我们才可能真正确立一种新的社会安排的远见卓识。

（作者系韩国延世大学校国学研究院院长 原文系英文 金品译）

注释：

可参见保尔·W.科内兹：《大韩民国的经济增长和结构》 纽黑文 耶鲁大学出版社 1977年版；李康洙和米歇尔·罗莫：《增长和结构转型》 坎布里奇 东亚研究会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79年版 戴维·科尔等：《关于韩国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 伯克利 东亚研究所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80年版 另参见洪斗性：《职业和阶层结构的变化及

前景》、《韩国社会的发展趋向》汉城 现代社会研究所 1983 年版 韩国发展研究院：《贫困的实态和零细民对策》，1981 年版。

关于社会变动和竞争理论讨论的概况，见艾娃·爱切尼-哈尔维：《现代社会的到来和成熟》伦敦 路特里奇和科安·保尔出版公司，1991 年版。

参见笔者关于朝鲜时期社会结构的论文：《关于韩国传统社会结构之特点的社会学考察》载于《延世论丛》第 14 期，1977 年。

有关该问题的著述颇多，请参见罗伯特·N·波拉：《基督教和儒学中的父子关系》，载于他所编的《信仰之外》，纽约，哈伯和罗出版公司，1970 年版 第 76—99 页。

这一观念见于罗伯特·N·波拉等编：《宗教和近代亚洲的进步》，1978 年版。

- ⑧ 见笔者所著：《朝鲜时代末期的社会变动和社会运动》载于《现象和认识》（社会科学季刊 第 2 卷第 1 期 1978 年春季刊。
- ⑦ 参见韩国教育部编：《教育年鉴》关于入学水平的比较 见表 4。
- ⑧⑨ 见诺曼·杰克伯：《韩国的近代化和发展之路》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162 页。
- ⑩ 有关这一时期韩国经济的历史性评论，参见前揭科内兹书第 28 页以下各页。
- ⑪ 有关的讨论参见前揭科内兹书第 2—3 章。
- ⑫ 参见笔者向韩国社会学学会年会提交的论文《韩国社会发展论》，汉城 1983 年 9 月 16 日。
- ⑬ 吴善任：《韩国女性勤劳者实态调查》，汉城，韩国女权者联盟，1980 年。
- ⑭ 宋孝善：《通往汉城之路》汉城 萤雪社 1982 年版。
- ⑮ 参见太焕权等：《韩国的人口》汉城 人口和发展研究所 国立汉城大学 1975 年版 特别是第 113 页之后 罗伯特·莱彼得等：《经济发展、人口政策和民主转型》，坎布利奇，东亚研究所，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 年版 第 143—160 页和 250—258 页。
- ⑯ 参见车在浩等：《韩国的男儿尊重思想》汉城 韩国行动科学研究所，1975 年版。

- ⑰ 勒依·P.琼斯和李涉康：《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企业和企业家 以韩国为例》 坎布利奇 东亚研究所 哈佛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第 259—260 页。
- ⑱ 参见他向美国社会学年会提交的论文：《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亲族团体和世袭控制》，1985年 8月 26日和 30日 华盛顿特区。
- ⑲ 参见《社长的条件》 载于《中央日报》，1985年 3月 1日。
- ⑳ 有关家庭价值观的广泛含义进一步讨论，见崔在锡：《韩国人的性格》 汉城 开文社，1965年版；另见笔者《韩国社会的变动和家族主义》一文 提交韩国社会学年会，1984年 12月 15日 并收入笔者所著《历史和社会变动》一书 汉城 韩国社会学研究所 民英社，1987年版 第 8章。
- ㉑ 对于韩国学生运动的分析，见前引书第 9章。
- ㉒ 见诺曼·杰克伯前揭书 第 62页 他在“世代相传”的总标题下归纳大学教师的作用，因为韩国普遍认为，教师如同父母那样对学生施加影响。
- ㉓ 欧文·W.古德纳认为，家庭不仅是构成社会现实的重要部分，在某些情况下，还是社会现实反对力量。该观点可见于他的《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出现》一书 伦敦 麦克米兰公司，1978年版 特别是第 73—74页。
- ㉔ 我在分析朝鲜时代的派别问题时，对此观点有简要说明，见注 所揭我的论文。
- ㉕ 对此问题可参见前引罗伯特·N.波拉编《信仰之后》一书中的论文 第 7—8章。
- ㉖ 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 儒教和道教》 纽约 麦克米兰公司，1951年版 第 14页。

转型中的韩国政治

[韩]韩升洲

韩国自 1948 年建立独立的政府以来，经历了好几个政治演变的阶段：1.“第一共和国”时期（1948—1960）即李承晚政权时期。在此期间，李的统治日趋独裁。2.“第二共和国”的民主政府时期（1960—1961）这个短暂的政权后来被军事政变推翻。3.朴正熙总统执政的半权威主义时期（1961—1972）。4.高度权威主义化的“维新改革”时期（1973—1979）该时期以 1979 年朴正熙总统被刺身亡而告结束。5.全斗焕政府的权威主义时期（1980—1987）。

纵观整个独立后的历史，韩国始终存在着一种对民主的强烈和急切的渴望。然而除了 1960—1961 年间短短 9 个月的民主时期外，韩国始终未能享有民主的政治。掌权者总是借助非民主的手段——操纵选举、压制异己力量、用不合法方式随意更改宪法；限制公民的基本政治自由权利等，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每当反对权威统治、要求民主的呼声逐渐成长壮大时，现政权就会使用更加强硬、更加严厉、换个说法，也更加老练的手段来对付。这继而又激起反政府力量更加强烈的反抗。

本文节译自美国拉里·戴蒙德 (Larry Diamond) 等主编的《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亚洲》。该书 1989 年由美国 Lynne Rienner 出版公司出版。文中的称谓和提法，仅供参考。

经过 40 多年权威主义占支配地位的政治统治之后，韩国现今正处于一个政治急剧变动的时期。过去的权威统治引发了来自社会各层面的不满。因此，尽管它作为一个曾适合于韩国的“行得通”的政治制度，或许也曾对韩国社会发展作出过一些贡献，现在却显然已被韩国民众拒绝接受了。人民对民主的要求和渴望是如此迫切和强烈，以致于那些权威主义统治的支持者也开始承认民主化是不可逆转的了。不过这里面却有一个显见的问题，即过去曾支撑韩国权威主义统治的那些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以及国际社会的因素是否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从而在现时期它们能够促成产生并维持一个成熟的民主政体。

人们普遍认为，现在的韩国政府是一个有着巨大的民主压力，并对民主要求作出过承诺的半权威主义的政府。而这些承诺是否兑现将取决于以下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即：如何解释过去韩国建立民主制度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扎不下根？如今，支持权威主义统治的因素和力量有多强大和多稳定？支持和反对民主制度的因素和力量又有哪些？民主的发展和巩固可能以何种途径出现？等等。以下进行一些理论分析。

何种因素一方面推进，另一方面又阻碍了韩国的民主化进程 进一步分析二战后韩国政治演变的历史 我们可以指出 是如下几个方面推动了韩国的民主化进程：1. 民主在受过高等教育的民众中的社会化；2.“中产阶级”的成长 其成员对经济成功和政治权利越来越有信心；3. 压制迅速发展的民主运动需要高额代价；4. 韩国要成为一个为外部世界所承认和接受的现代民主国家的愿望，这种地位在经济持续发展中变得越来越重要；5. 韩国为自身的安全需要与美国结盟而具有的独特的外向性。

在社会变化之下，推动民主发展的是过去 20 多年间韩国所取得的经济的急速增长。1967—1987 年间 韩国的经济每年以